

现代与传统之间

——巴黎拉丁区与 1920 年代的中国文人

杨 振*

摘 要:1920 年代,大量来法游历的中国文学家和艺术家聚集于巴黎拉丁区。他们中有以传播法国文化为志愿的文化考察者,也有仅以散心为目的的游客。他们中有人感到拉丁区的古典美与中国古典美的共通之处,有人则感到文化差异造成的不适。本文将揭示 1920 年代中国文人因拉丁区这一异国文化空间而发生的对文化现代性与永恒性的思考,分析拉丁区在中国现代文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文章借助包括 1920 年代由华人参演的法国电影剧照在内的各种文本,重构由当时活动在拉丁区的中国文人组成的天狗会原貌。作者通过一份菜单以及各种相关记载,还原位于巴黎索邦大学附近、作为当时拉丁区中国文人交游重要公共空间的万花酒楼原貌。

关键词:巴黎拉丁区 1920 年代 现代与传统 中国现代文学

拉丁区是如今赴法留学的中国学生最熟悉的巴黎街区之一,以先贤祠、索邦大学、卢森堡公园、圣日耳曼大街、圣米歇尔大街,以及各种博物馆、教堂及文化机构而著名。早在 1920 年代,拉丁区就以知识分子聚居区的概念进入了中国文学想象。叶鼎洛的小说《拉丁区的案子》,讲述了与巴黎拉丁区并无直接关联的一家中国学校里师生间的故事^①。事实上,由于拉丁区与法国文教机构的特殊渊源,以及当时此地低廉的房租价格^②,1920 年代大量来法游历的中国文化精英和留学生在这里聚集。他们如何叙述这一异国空间?这些叙述反映出他们对现代性的何种理解?他们彼此的交流和碰撞如何进行?这种交流如何促进现代文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本文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拉丁区与古典美的失而复得:李思纯、陈学昭的拉丁区经验

1925 年 11 月,李思纯在发表于《学衡》第 47 期的译作《仙河集》自序中,这样回忆拉

* 作者简介:杨振,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法比较文学。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法国文学在民国文学期刊中的译介”(项目号:15CWW008)的部分研究成果。

① 叶鼎洛:《男友》,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 1927 年版,第 159—215 页。

② 20 世纪 20 年代拉丁区房租价格之低廉,甚至成为这一社区的重要特点,被当时的中国报纸报道。见唤醒:《谈巴黎》,《民国日报·觉悟》1924 年 10 月 5 日。

丁区:

余居欧五年,而居巴黎拉丁区(quartier latin)凡三年余。…今年反蜀,居里中。天下方乱,群盗满山。回思拉丁区旧游,如在天上。^①

1926年,作者撰写了一首题为“巴黎拉丁区”的诗,怀念他的留学生活:

巴黎名都会,繁丽压百城。虹腰二百桥,镜水仙河明。楼舍极雕绘,夜沸笙管声。铜街粉麝满,玉颊貂褕清。铁塔起回环,离宫绚峥嵘。岂惟歌舞娱,真见制作精。雍熙嘉礼俗,宴乐昭性情。登涉园圃美,图史丘山平。三年跻大庠,负笈愧所成。梦中拉丁区,逝迹疑前生。^②

除上述诗歌外,李思纯曾为巴黎撰写过13首诗,发表于1923年2月出版的《学衡》第14期上。纵观这些诗作我们发现,巴黎对于作者来说,并非一个充满现代性的异质空间,而是一个充满怀旧气息的空间,唤起作者对于中国古代都城的回忆。我们只需将这些诗中描写巴黎城市景观的细节并列出来,便能证明这一点:“云水”、“物华”、“江山”(“圣克鲁市小山回望巴黎”);“珠箔”、“笙歌”、“铜街”、“车马”(“秋雨夕凭楼四望”);“烟水”、“人家”、“木落”、“朝晖”、“灵祠”、“凤阙”、“钿车”、“芳华”(“晓度色仓河桥”);“锡箫”、“彩履”、“松炬”、“千家烛”、“花旛”、“万户”、“疏钟”、“灵曲”、“空房”(“圣诞节诺特丹姆寺听歌乐”)等。

在巴黎杂诗十三首之《卢森堡园晚坐观喷泉》一诗中,李思纯这样描写卢森堡公园:

白石红栏影,纤云澹月晖。横空珠树出,跳沫玉龙飞。低亚花三面,婵娟水四围。也堪娱独客,无复念东归。^③

仅读前两句诗,我们会以为作者在描述一个中国古代园林。作者用“白石”、“红栏”、“纤云”、“澹月”来重构卢森堡公园,说明他根本无意突出这一空间的文化异质性^④。这一现象有两个可能的原因:首先,李思纯也许发现拉丁区具有古典美,这种西式古典美的气质很容易唤起他对以宁静和谐为特征的中国古典美的回忆;其次,李思纯对于旧体诗词似乎情有独钟。从2009年版的《李思纯文集》看来,李思纯毕生坚持写作旧体诗词^⑤。他曾用五言和七言律诗翻译15世纪至19世纪数位法国诗人的作品,结成《仙河集》发表^⑥。

同样在拉丁区感受到古典美的还有1920年代留法女作家陈学昭。陈学昭强调,巴黎之所以值得回忆,是因为巴黎给了她用恒定的目光审视自己款款前行步态的可能。在《忆巴黎》一文中,陈学昭描写自己像古典仕女那样,在巴黎这个空间中稳当地、安然地走过:

① 李思纯:《仙河集自序》,《学衡》,第47期,1925年11月。

② 陈廷湘、李德琬主编:《李思纯文集》(诗词卷),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1353页。

③ 李思纯:《卢森堡园晚坐观喷泉》,《学衡》,第14期,1923年2月。

④ 此诗中唯一能让中国读者感受到文化异质性之处,是作者对于作为现代文明成果的喷泉之奇巧的赞叹。

⑤ 陈廷湘、李德琬主编:《李思纯文集》(诗词卷),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年版。

⑥ 关于用中国古诗体翻译法国诗歌对原作风格的影响,详见笔者对李译弗朗索瓦·维庸作品的研究:Yang Zhen,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ans les revues littéraires chinoises entre 1917 et 1937*, thèse soutenue le 9 septembre 2014 à l'université Paris-Sorbonne, pp. 114-116.

我一天至少有二次经过卢森堡园的热闹的喷水池边,我怯弱的而又安然的走过,一年多来不止数百次了!压住我蓬长之黑发的大黑帽,披着一件青黑色的外衣,从先贤祠边的落令处走过,我已俨然成为巴黎人之一份了!^①

陈学昭对拉丁区行路经验的描述以当时的上海为参照。她写道:

当我不曾到巴黎的时候,我设想它的热闹,必与上海是相像的,如南京路的车马的乱闯,四马路石路一带的人的拥挤,彼此衣袂相碰,忙乱,紧张,扰动,虽在冷漠的人,也不能不感到怯怯然的不安!^②

陈学昭的不安有所特指:走在上海的路上,她怕被横行的车马撞伤。相比之下,巴黎汽车的有序行驶让她感到安定。她并不将此归功于理性的工业文明成果,而是从中看到了更为普世的价值:

这不单是因为我信任了它们之不会害我,没有机心相猜,实地是明白它们之对我并无尊卑,我们都操有生命的尊贵之权力,相等的权力,这个权力,一到中国,便失去了!^③

拉丁区与古典美的缺席——徐志摩、邵洵美的拉丁区经验

相比于盛赞拉丁区的李思纯和陈学昭,徐志摩对于拉丁区的态度显得较为暧昧。像许多浪漫主义诗人一样,对于徐志摩而言,远离故土来到巴黎,本身就是在接近诗的世界。在1929年4月25日致刘海粟的信中,徐志摩这样写道:

海粟,你到了欧洲,到了巴黎,方觉得到了家。不是我想,你一定悔不早行。巴黎的风光更有那处的可比?我也早晚只想再长翅膀,得往外飞腾。上海生活折得死人,怎么也忍耐不下去!^④

在徐志摩看来,上海是一个充满现代物质文明的空间,对物质文明的追求会戕害人的性灵,让作家失去创作的灵感。他认为,久久不愿离开上海是导致陆小曼堕落的直接原因。《婚前闲札》中的一句话可以说明徐志摩与陆小曼之间的分歧:

我想在霜浓月澹的冬夜独自写几行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们到涂蜡的跳舞厅去艳羨仕女们发金光的鞋袜。^⑤

徐志摩于1928年赴欧洲旅行,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抗议陆小曼生活的堕落^⑥。如果说

① 野渠:《忆巴黎》,《语丝》,IV—44,1928年11月12日。

② 野渠:《忆巴黎》,《语丝》,IV—44,1928年11月12日。

③ 野渠:《忆巴黎》,《语丝》,IV—44,1928年11月12日。

④ 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六卷),第23页。

⑤ 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五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7页。

⑥ 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六卷),第158页。

当刘海粟感叹巴黎女人衣着之时尚非当时上海女子可比时^①,是将巴黎和上海同视为现代性空间,并在二者之间建立起高低等级,那么,徐志摩将上海与巴黎对立起来,其动机则恰恰相反,他希望巴黎是一个与上海不同的反现代空间。他将巴黎拉丁区想象为一个可以滋养性灵的居所。他的英文信件显示,1925和1928年他在巴黎短住时,每次均以拉丁区作为自己的通讯地址。1925年时6、7月间,他的通讯地址为 Du Sommerard 路9号^②,紧邻索邦大学,著名的中世纪博物馆就在这条路上;1928年9月,他在巴黎的通讯地址为 Descartes 街11号^③,位于先贤祠广场上,离索邦也很近。

不过,徐志摩并未为拉丁区留下很多文字记录。他在1925年6月25日致陆小曼的信中说,他在巴黎的生活“简直是‘行尸走肉’,有时到赛因河边去看水,有时到清凉的墓园里默想”^④,仅此而已。如果我们想象徐志摩从自己在拉丁区的住所出来,沿着圣米歇尔大街往巴黎圣母院方向走,不久便可以走到塞纳河(徐所谓的赛因河)边。他所看到的,不是意趣幽远的河景,却是河两岸鳞次栉比、用巨大石块砌成的建筑群。那种物的充盈所造成的美景,也许并不合他的口味。相比之下,似乎剑桥的风物更能够让徐志摩展开抒情和想象的翅膀。徐志摩为剑桥留下诸多笔墨,且每次都包含情感。在“再别康桥”中,徐志摩成功地将自己的情感、诗的节奏韵律和风景熔为一炉,而这种风景完全是自然之景,几乎没有一件人造物。

如果说身处巴黎的徐志摩心中依然有寻找中国古代诗意空间的焦虑,邵洵美则要显得洒脱许多。相比前三位文人,邵洵美在拉丁区的审美经验多了一些我们可以定义为现代的特质:感官的刺激、瞬间的印象。他这样描述在卢森堡公园旁一家画苑临摹女性裸体的经历:

我最感到兴味的是拿了画夹,袋了木炭,跑过了 Jardin de Luxembourg,再穿过一条马路,转个弯,走进一所深灰色的房子,在一个七八寸高的平台上,便有一个赤裸著上下身的女子在扮著各种的形态,有时挺起了乳儿,有时分开大膀,五分钟换一种样式,你便尽将你在刹那间所得到的她的全身的轮廓的印象,钩在纸上。坐两个钟头,你可以有一二十张速写,带回家去靠著窗再细自揣摩。^⑤

在《巴黎女人》一文中,邵洵美再次突出了巴黎女人给他留下的印象之瞬间性和流动性:

衣香,粉香,以及巴黎女人所特有的肉香,也开始钻进我鼻孔里来。我更惊觉着建筑物平静的色彩以外还有许多流动的色彩在眼睛面前闪爨。^⑥

① 刘海粟:《欧游随笔》,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0页。

② 这条路似乎很早就为当时的中国人所熟知。据蒋碧薇回忆,1919年她和徐悲鸿到达巴黎时,就住在这条“苏美拉路”上,最初住13号,后来搬至徐志摩住过的9号,当时谢寿康和苏希洵也住在这条路上。见蒋碧薇:《蒋碧薇回忆录(上):我与徐悲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7—49页。以巴黎拉丁区中国留学生生活为背景的小说《留西外史》中提到的“苏墨拉街”,很可能也是这条路。见陈春随(陈登恪):《留西外史》,新月书店1928年版,第86页。

③ 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六卷),第314、344页。

④ 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六卷),第97页。

⑤ 邵洵美:《巴黎的春天》,《真美善》,IV—1,1929年5月16日。

⑥ 邵洵美:《儒林新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81页。

邵洵美对巴黎女人的这段描写,是他参观巴黎装饰艺术和现代工业国际博览会时留下的印象^①。该展览会于1925年4月至10月间在巴黎举行。邵洵美曾将该会发行的一组六张明信片寄给盛佩玉。据盛佩玉回忆,邵洵美参观该博览会的时间是1925年暑期^②。当时邵洵美从英国去巴黎小住。邵洵美后来保存的一张旅馆账单以及由这张账单引出的一段关于巴黎拉丁区生活的回忆告诉我们,当时他住在紧邻索邦的Cujas街Excelsior旅馆,与谢寿康为邻^③,后者日后成为外交家,用法文撰写《中国戏剧》、《东方西方:交互反映》,并用法文翻译了剧本《李碎玉》^④。

拉丁区的中国文人组织:天狗会

据《儒林新史》记载,邵洵美去参观巴黎装饰艺术和现代工业国际博览会之前,和谢寿康、徐悲鸿、蒋碧薇、张道藩等几个朋友在拉丁区最著名的中国饭店万花酒楼吃饭。席间徐悲鸿介绍邵洵美参加天狗会。该会主要由活动在拉丁区的中国画家组成。据蒋碧薇说,天狗会成立时,《旅欧周刊》和巴黎各报均有报道^⑤。但笔者查询《旅欧周刊》各期“旅欧新闻”一栏,均未找到相关报道。目前能够阅读到的专门介绍或研究天狗会的文章颇少,我们只能根据各种史料的片言只语,重构该会的状况。据说天狗会成员尊崇古希腊哲学家安蒂斯泰纳(公元前444—公元前365)为祖宗^⑥,他们的大本营就在卢森堡公园前门靠近地铁站的“别离”咖啡馆^⑦。徐悲鸿1926年接受采访时提供的数据显示,该会约有二十余名会员^⑧。其中常为后人提及的有四兄弟,按年龄分为老大谢寿康,老二徐悲鸿,老三张道藩,老四邵洵美^⑨。天狗会虽然是一个非正式的组织,但似乎直到1934年仍然存在:张道藩曾于1934年1、2月间以天狗会的生活片段为背景写成一部名为《自救》的剧目,该剧于同年9月在南京公演后,收到了来自天狗会的花篮^⑩。

① 盛佩玉:《盛氏家族 邵洵美与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邵洵美:《儒林新史》,第75—81页。邵洵美对展览会名称的回忆与事实略有出入。

② 盛佩玉:《盛氏家族 邵洵美与我》,第59、62—63、67—69页。

③ 见邵洵美:《搬家》,《狮吼》,复活号第5期,1928年9月1日。《狮吼》随后的第8期“叶秋原先生来函”和《花一般的罪恶——狮吼社作品、评论资料选》(张伟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目录”,p.3。)均将此文视为小说。事实上,《狮吼》半月刊复活号1—8期的目录显示,该刊编辑在目录中唯一明确注明为小说的,只有第1期中滕固的“Post Obit”。其余各篇,除诗外,均未特别标明体裁。除笔者直觉这是一篇具有纪实性的散文外,另一个事实更让我们可以将该文用作史料:《狮吼》复活号第5期《我们的话》一栏写道:“‘搬家’是洵美最得意的近作;是诗的笔法,小说的结构的散文(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这里我们在他素有的甜味中竟会感到些辣味。”(《我们的话》,《狮吼》,复活号第5期。)

④ C. K. Sié, *Est-Ouest, reflets croisés*, Paris, Maison du livre français / Bruxelles, Éditions Labor, 1932; Xie Shoukang, *Le Théâtre chinois*, S.l., 1938; Liou-Kio-Jen, *Le Jade brisé*, trad. Chéou-Kang-Sié, Bruxelles, R. Van Sulper, 1927.

⑤ 蒋碧薇:《蒋碧薇回忆录(上):我与徐悲鸿》,第57页。

⑥ 谢寿康:《自救》及《第一次的云雾》,张道藩编著:《自救》,正中书局1947年版,第151页。

⑦ 邵洵美:《儒林新史》,第93页。

⑧ 万叶:《留法艺术专家徐悲鸿君访问记》,王震编:《徐悲鸿文集》,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⑨ 赵友培:《文坛先进张道藩》,重光文艺出版社1975年版,第53—54页;蒋碧薇:《蒋碧薇回忆录(上):我与徐悲鸿》,第65页;盛佩玉:《盛氏家族 邵洵美与我》,第68页。

⑩ 张道藩编著:《自救》,第117、134—135、141—142、144页。

谢寿康在一篇文章中曾说:天狗会“会员认真骂人,就称人为会长”^①。邵洵美对1925年暑期天狗会成员在万花酒楼聚餐的记述让我们对这句话有了进一步理解。当时张道藩向邵洵美介绍说,天狗会的第一件要务是要打倒会长,避免像很多其他组织一样,为了会长问题你争我夺,相互算计^②。天狗会会员为了将会长变为被戏谑的对象,以显示他们去权利中心化的决心,决定任用了一个近似男妓的留学生做会长。徐悲鸿这样为邵洵美刻画这位韩姓会长:

他生得奇丑无比,前年巴黎有家公司拍中国生活的电影,他在银幕上扮一个鸦片鬼。他满脸是胡须根,可是粉擦得和领子的颜色一样;他袖口里总塞着一块粉红手帕,在圣米西街上很有名,生意比最漂亮的鸡要好得多。^③

1920年12月18日《旅欧周刊》“旅欧新闻”一栏有如下记载,可为邵洵美提到的电影做注脚:

近来巴黎电影场,忽发现一剧,名曰《凶恶之李杭》。内中主要人物,为华人丁某等扮演。因剧中曾插入我国之吸鸦片赌博等恶习,及炮烙站笼担枷等非刑,颇引起观者对于中国人不好之感想。因此巴黎中国学界中,颇有认此事为有伤我国体面,已经呈请总领事设法劝戒或阻止之矣。^④

《凶恶之李杭》(*Li-Hang le cruel*)是Édouard-Émile Violet导演于1920年出品的一部电影。影片中,中国一家欧洲银行行长史蒂文因为破产,不得不向中国富人李杭求助。李杭以娶史蒂文侄女摩德作为交换条件。尽管摩德有自己的心上人理查德,但为了自己的叔叔,不得不违心嫁给李杭,却又对理查德念念不忘。李杭发现摩德和理查德有私奔的念头,设计将他们捉住,关押在一座房内,并放出两条蟒蛇准备加害于他们。结果因为设计机关有误,一条蟒蛇临时调转方向,扑向李杭,李杭被蟒蛇束缚致死,摩德和理查德则有情人终成眷属。法国电影档案馆(CNC)所藏该电影残片中,未能保留李杭吸食鸦片的镜头。但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该电影剧照中,则有反映李杭吸食鸦片的照片(见下图。图左最前面的卧者为史蒂文,图右卧者为李杭)^⑤。该片中吸食鸦片的中国主人公名为Tsin-Hou。由于现存各种资料没有该名的中文原名,因此我们很难肯定,Tsin-Hou就是邵洵美笔下的“老韩”。邵洵美的回忆是否会出错,也是值得怀疑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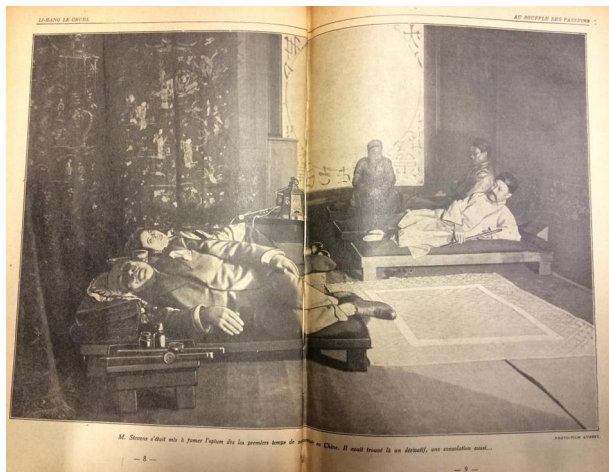
① 谢寿康:《〈自救〉及〈第一次的云雾〉》,张道藩编著:《自救》,第151页。

② 邵洵美:《儒林新史》,第71页。

③ 邵洵美:《儒林新史》,第70页。

④ 《演电影与国体问题》,《旅欧周刊》,第58号,1920年12月18日。

⑤ Marcel Priollet, *Li-Hang le cruel, tiré du film de A.-de Lorde et H. Bauche*, Paris, Édition du livre national, pp. 8-9. 图片底部的法文注释意为:“史蒂文先生一到中国便开始吸食鸦片。他在其中得到消遣,也得到安慰……”



不过,基本可以肯定的是,邵洵美笔下的“老韩”,并非杜撰的结果。在陈登恪的《留西外史》中,我们又见到了这位活动在拉丁区的天狗会会长。只是这一次,他以“老梁”的名字出现在靠近卢森堡公园和圣米歇尔大街(即上述引文中的圣米西街)的 Soufflot 咖啡馆中。陈的描述丰富了对他的印象:

对面安南人棹上又添了一个瘦小中国人,穿着一身浅黄色白直条子的衣服,一件麻灰白格子的春季外衣,披在肩上,两臂并未穿入袖内;颈上托着一条红黑绿三色丝围巾,一半拖在胸前,一半搭在背上;脚上是丝光袜,漆皮鞋;三个手指宽又干又枯的脸上,擦了一层白粉,不知何故,粉是粉,脸是脸,两不相容,犹如一个干柿饼似的,七零八落,又好像一座粉墙,被风雨剥蚀一般。光可鉴人的头发,是不用说了。一个既宽且大美术家式的大红领结,将胸部几乎完全遮住。动手动脚,干着喉咙,在那里和那两个塌鼻子安南少年并那胖妇人调笑。^①

回到邵洵美笔下经徐悲鸿转述的“老韩”。此人不仅穿着打扮跨越了性别界限,还被天狗会会员想象成男性性消费的对象。这两点被利用来作为讽刺集权心态的手段。如果说对于社会组织中掌权者中心论的嘲讽体现了天狗会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是不彻底的。说到底,在天狗会会员心目中,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是相对于具有女性特质的男性而言级别较高的集团,前者甚至可以将后者视为消费品使用。

拉丁区与中国现代文学知识的传播:郑振铎、梁宗岱的拉丁区经验

郑振铎的拉丁区经验,既有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也揭示了现代知识传播的过程。郑振铎于1927年5月乘坐 Athos 号从上海启程去法国,与徐霞村和陈学昭同船。郑和徐到达巴

^① 陈春随(陈登恪):《留西外史》,第82—83页。本书中与此人身份相关的段落,另见第138—139页。

黎第一天,便下榻在 Sorbonne 路一家叫 Garson 的旅馆^①。在拉丁区居住期间,郑振铎有时会去卢森堡公园散步,或在那里读法文和文学作品,有时穿过卢森堡公园,去中法友谊会读中国报纸。不过,郑振铎更经常地以文化遗产考察者的目光来审视拉丁区:他时常参观卢森堡博物馆,索邦对门的中世纪博物馆,还曾参观过先贤祠和索邦大学的教堂^②。每到一处,郑振铎都力图弄清该文化机构的历史,详细记录,以备日后介绍给国人。郑振铎在记录他的游览经历时,时常流露出对文化遗产的珍视。例如,他第一次匆匆参观中世纪博物馆后,颇觉得不够,暗自下定决心,下次要细细看过,专门撰文介绍之^③。不过,最让郑振铎流连忘返的,还是卢森堡博物馆。据他的日记显示,1927年7月至8月间,他曾至少7次来此参观。他这样记录下第一次来此参观的感受:

进了这个地方,仿佛入素来熟悉的所在。中有许多图画都是我久已见得他们的复制片的,有的曾登于《小说月报》上,有的曾悬挂于我家的壁上。所以觉得非常的亲切。虽然地方不大……然殊使我流连不忍即去。^④

郑振铎将卢森堡博物馆视为代艺术品的收藏地,并将自己定义为一个追求现代性的艺术鉴赏者。不过,郑振铎并未在日记中告诉我们,卢森堡博物馆的现代艺术品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打动了。相反,他吐露了现代艺术精神难以捉摸的困惑。1927年8月19日,他这样记录再次参观卢森堡博物馆时感想:

我的心境觉得变化得很厉害,上次以为不好的,这一次却以为十分的好,上次以为很好的,这一次却也有觉得他不见得好的。批评艺术而用个人的一时感情,一时直觉去评衡,真是危险呀!^⑤

郑振铎在拉丁区居住数月,身边时常围绕着许多留学欧洲的中国文学青年。我们以他和梁宗岱的交友为例,揭示中国体制内的文学精英如何在和留学生的交往过程中,协助生产现代文学知识。

据说,梁宗岱于1926年秋天从巴黎郊区搬往市区居住,不久便结识了当时著名的诗人瓦莱里。瓦莱里1927年约会记事册中与梁宗岱有关的记录以及梁宗岱1927年3月至1929年6月之间信件所用地址显示,梁至少从1927年开始,便住在紧邻索邦与先贤祠广场的 Cujas 街19号^⑥。很可能是当时梁宗岱和郑振铎在拉丁区比邻而居的缘故,郑振铎到巴黎后第二天(1927年6月27日),便两次在拉丁区的路上遇见梁宗岱。第二次相遇时,梁宗岱邀请郑振铎去他家小坐,并给他介绍了瓦莱里。郑振铎写道:

他买了不少的书,都装订得很华丽。他说:他的生命便是恋爱与艺术。而他近来

① 徐霞村:《巴黎游记》,光华书局1931年初版,1937年3版,第47页;郑振铎:《欧行日记》,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版,第86页。

② 郑振铎:《欧行日记》,第90、112、113、126、130—133、156、177、179、181、204页。

③ 郑振铎:《欧行日记》,第112页。

④ 郑振铎:《欧行日记》,第113页。

⑤ 郑振铎:《欧行日记》,第177页。

⑥ 刘志侠、卢岚:《青年梁宗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页。

有所恋,心里很快活。他比从前更致力于诗;他所醉心的是法国现代象征派诗人瓦莱里(Paul Valery),这个诗人便是在法朗士(A. France)死后,补了法朗士的缺而进法国学院(L'acadima de France)的。他是现代享大名的诗家。梁君和他很熟悉。所以受了不少他的影响。^①

很难说郑振铎在与梁宗岱相遇前是否就知道瓦莱里。郑振铎于1927年6月把《小说月报》主编之职暂托给叶圣陶,动身赴欧^②。就在这一期《小说月报》《文坛消息》一栏,登出了徐霞村作《保罗哇莱希进法兰西学院》一文。这是我们目前所知中国关于瓦莱里最早的介绍。上述引文中所提到的内容,徐霞村的文字中均有提及^③。不过,即使郑振铎从徐霞村那里了解到瓦莱里,也未必会引起什么兴趣,因为徐的短文对瓦莱里本身文学价值的揭示甚少。引起郑振铎对瓦莱里兴趣的任务,最终还是落到了梁宗岱头上。在见到郑振铎一年后,梁宗岱完成了《保罗哇莱荔评传》一文,本来准备通过徐志摩送交《新月》出版^④,不知何故未成。文章最后于1929年1月发表于《小说月报》,这正是郑振铎从欧洲归国后重新编纂的第一期《小说月报》。

拉丁区的中国文人聚集地:万花酒楼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拉丁区中国文人交游公共场域的万花酒楼。上文提到天狗会成员1925年暑期在万花酒楼聚餐。郑振铎和徐霞村抵达巴黎当天也去那里用餐,并遇见了《法兰西文学》(1923年商务印书馆初版)的作者袁昌英^⑤。据郑振铎说,袁昌英几乎每天都去那里吃饭。此后,郑振铎也经常去那里吃饭,并以宴请或接受宴请的方式,与朱光潜、梁宗岱、敬隐渔、袁昌英等多位法国文学译介者在那里吃饭。从《欧行日记》来看,万花酒楼这个公共场域至少协助传播了三种知识:法语、德国戏剧和法国汉学。郑振铎与袁昌英因为在万花酒楼初遇而建立联系,以致郑振铎日后请袁昌英为其寻找法文教师;一日,郑与袁同在万花酒楼吃饭,饭后袁约郑去歌剧院看《洛罕格林》;另一日,梁宗岱请郑振铎和俄裔法国汉学家马古烈^⑥在万花酒楼吃饭,席间郑同马约定时间去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看中文藏书^⑦。最能反映万花酒楼作为在法华人知识传播中心地位的是胡适在万花酒楼用餐的经验。胡适在1926年8、9月间旅居巴黎期间,曾数次在万花酒楼吃饭^⑧,其中一次同席者有梁宗岱、傅斯年以及万花酒楼的老板张楠。在那次宴请中,巴黎国民党支部的一些成员在酒楼里散

① 刘志侠、卢岚:《青年梁宗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页。

② 唐沅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页。

③ 徐霞村:《保罗哇莱希进法兰西学院》,《小说月报》,XVIII—6,1927年6月。

④ 见1928年9月20日徐志摩至胡适信。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六卷),第255页。

⑤ 郑振铎:《欧行日记》,第86、151页。

⑥ 关于马古烈生平,可见 Angel Pino, notice biographique de Georges Margouliès (1902-?), in Pierre Labrousse (éd.), *Deux siècles d'histoire de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éditions Hervas, Paris, 1995, p. 294.

⑦ *ibid.*, pp. 108, 130, 151.

⑧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4 1923—1927》,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264、266、341、343、357页。

发反对胡适的传单,将之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叛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走狗^①。

万花酒楼成为当时巴黎华人传播思想的重要阵地,与其在拉丁区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法国华人三百年》作者叶星球先生根据手头保存的一份万花酒楼菜单,考证出该饭店至少在某一历史时期曾位于拉丁区医学院街2号(2, rue de l'École-de-Médecine)^②,离索邦只有五分钟不到的步行路程。据说该饭店有一个法文名,直译为莲花饭店(Restaurant Le Lotus)^③。

我们在1920年10月2日的《旅欧周刊》上,读到一则万花酒楼的广告:

专办京都菜式 随意小酌 铺陈雅洁 价格相宜 诸君光顾 本号无任欢迎。^④

1921年4月7日《晨报》第六版上V女士发表的“华人在法经营之各种组织”一文中,提及“万华酒楼”。此文被刘志侠和卢岚作为万花酒楼史料引用时,并未注明其与“万花酒楼”的一字之差。V女士未注明该酒楼的具体地址,但和梁源法、叶星球一样,强调该酒楼之豪华。其中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想象当时中国文人在万花酒楼宴饮场景的一种可能:

布置很特别,门前金字招牌,并印有金色古画…其中…歌女奏曲,堂官(原文如此——引者注)往还,很象中国的官座,所用的器具,都是中国的古器。

徐霞村这样描写1927年的万花酒楼:

万花酒楼离旅馆并不很远,只穿过一条大街就可以看见它的大匾。虽然房子是西式的,里面却很带中国的味道,朱红的色彩和东方的图案充满了全厅。成堆的中国学生聚在桌子上。间或也杂着一两个西洋的男女。^⑤

陈登恪在1928年发表的小说《留西外史》中也曾写到万花酒楼。他着力突出该饭店的昂贵和档次之高^⑥,这与万花酒楼菜单上自称为“巴黎最大的中餐馆”相吻合。

我们在2014年发表的《法国华侨华人社会发展简史》中找到了关于万花酒楼最近的叙述:

“万花楼酒家”有四间门面,连地面上下三层,每层清一色都是中国宫殿式飞檐绿瓦,气势宏伟,古色古香,左边第一间是入口大门,上面从右到左书写“万花楼”三字,字体雄浑,这是有名浙商、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手笔。“万花楼”内部装潢富丽堂皇,高雅华贵,气派豪华。……餐厅用的碗盏盘碟,全部在中国江西景德镇定做,待客用的象牙筷子,一双筷子中间用银链连接一起,这是当时巴黎最豪华的中国餐厅。^⑦

据《法国华侨华人社会发展简史》作者之一叶星球先生告诉笔者,该段信息来自于李石

①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4 1923—1927》,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40—341页。

② 感谢叶星球、端木美、李宏图和张剑几位先生的帮助。

③ 关于餐馆地址的信息在如下两本书中被提及:梁源法、叶星球:《法国华侨华人社会发展简史》,巴黎太平洋通出版社2014年版,第46页;刘志侠、卢岚:《青年梁宗岱》,第156页。

④ 《旅欧周刊》,第47号,1920年10月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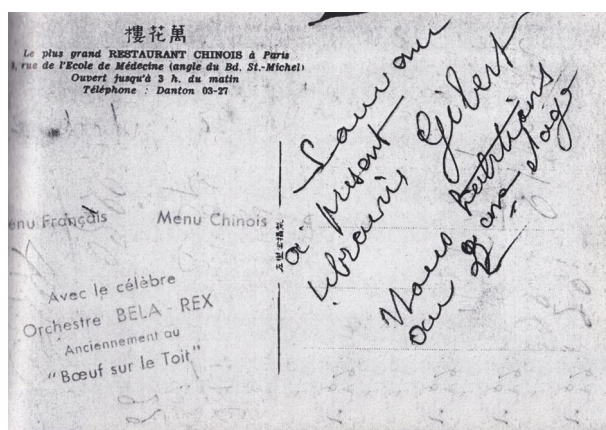
⑤ 徐霞村:《巴黎游记》,光华书局,1931年初版,1937年3版,第45页。

⑥ 陈春随(陈登恪):《留西外史》,第102页。

⑦ 梁源法、叶星球:《法国华侨华人社会发展简史》,第46页。

曾的秘书钱直向(1912—2006)的叙述。据《法国华人三百年》记载,钱直向于1936年赴法。因此文中描述的是1930年代以后的万花酒楼^①。

上述所有文字,均突出万花酒楼内部氛围的中国特色。不过,叶星球先生提供给笔者的一张该酒楼菜单的影印件展示了酒楼文化氛围的另一面。菜单上有这样一段铅印文字:“(本店有)著名的BELA-REX乐队演出,该乐队曾在‘屋顶上的牛’演出。”“屋顶上的牛”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巴黎一家著名的歌舞餐饮馆,是巴黎知识界名流,特别是著名作家Jean Cocteau经常光顾的地方^②。



李思纯和陈学昭在拉丁区体会到古典美。在他们看来,相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拉丁区与其说展现了进步,不如说展现了永恒的价值:遵循秩序,一视同仁地尊重生命。虽然与李思纯和陈学昭一样,徐志摩也将古典美作为一种诗学理想,但似乎是对物的拒斥,让他在拉丁区的逗留未能够满足他对于巴黎作为理想他处的期待。至于邵洵美,不论是临摹裸女,抑或是从徐悲鸿口中听说圣米歇尔大街上奇装异服打扮的“老韩”,他的拉丁区经验都充满现代性色彩。与抱着玩家心态的邵洵美不同,郑振铎抱定文化考察者的姿态,认真体会着拉丁区现代艺术展给他带来的震撼与困惑。

拉丁区的街道是当时中国文人交际的重要场域。郑振铎因为与梁宗岱在这里偶遇,进一步加深了对瓦莱里的了解,为日后《小说月报》刊登《保罗哇莱荔评传》奠定了基础。万花酒楼更是中国文人精神交流的平台。在这里,邵洵美加入具有反抗强权精神的天狗会;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华人号召抵抗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郑振铎找到学习法语、了解西洋戏剧和东方语言学院中文古籍藏书的机会。

1920年代中国文人选择在巴黎拉丁区聚集,接受他者文化无处不在、切切实实的冲击。他们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接受或拒斥、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怀念或批判,碰撞出种种火花。这是我们在谈1920年代中国和法国文化知识生产史时,不应忽略的场景。

^① 叶星球:《法国华人三百年》,太平洋通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

^② https://fr.wikipedia.org/wiki/Le_Bœuf_sur_le_toit .